



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列



中国公民 慈善意识培育



ZHONGGUO GONGMIN
CISHAN YISHI PEIYU

陈东利 著

中国公民
出境旅游文明行为规范

中国公民 出境旅游文明行为规范

国家旅游局

中国公民慈善意识培育

陈东利 ◎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公民慈善意识培育/陈东利著. —上海：上
海大学出版社, 2014. 11

(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列)

ISBN 978 - 7 - 5671 - 1475 - 3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慈善事业-研究-中国
IV. ①D63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8967 号

责任编辑 徐雁华

封面设计 倪天辰

技术编辑 金 鑫 章 斐

中国公民慈善意识培育

陈东利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57 千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671 - 1475 - 3/D · 160 定价：48.00 元

序言 | Preface

康德的墓志铭上写道：“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复地思考，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道德法则缘何如此神圣，令人赞叹和敬畏？因为只有人才会自己给自己设定行为规范，因为人是理性的存在物，人有自由意志，人有良知，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宗教、道德和法律都是人创造的，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对人性的贪婪、邪恶、嫉妒、凶残、诡诈、恶毒、狂傲以及战争的频仍等灾难的反思，是为了消解人的日益膨胀的贪欲和生存资源相对匮乏的矛盾，首先创造了宗教，之后由习俗、禁忌演化为道德，再后由道德演变为法律。

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也是世界上最凶狠、卑鄙、无耻的物种，人类社会的文明就是在不断克服人的贪欲和无耻中进化的。在卢梭看来，造成人与动物之间差别的不是理解能力而是自由意志。人类的智力发展应归功于人的欲望，而这种天生的自我发展能力正是我们不幸的根源。同时在人的精神和智力方面还包括同情心。儒家的仁爱之心、基督教的博爱之心都和同情心类似。早在中世纪，大多数基督教把收入的 1/10 捐赠给慈善事业，用以救济鳏寡孤独者或赎买奴隶等，教会常常会以入教的 1/3 或 1/4 费用给穷人以示爱心，这一传统源远流长。在基督教义中，穷人才是清洁的。信徒们相信，只要爱上帝、爱人如己、做好职业生涯中的每一件事，当肉体腐烂时，灵魂可以得到永生。信徒们拼命挣钱，认为为了荣耀上帝就该把钱分给穷苦的兄弟。

奥古斯丁认为财富是上帝恩赐给人们的，上帝把这个世界上所有能给予人们的东西都给了人们，人们通过劳动获得财富正是符合了上帝的意志，这种通过劳动获得财富的行为就是符合上帝的正义行为。阿奎那强调私有财产具有神圣性，认为任何一个人只要有超出自己生活需要的东西亦即多余的东西，就应该去

帮助穷人。早期基督教的财富观认为,富人积累财富去过骄奢淫逸的生活是有罪的,而这种罪可以通过向穷人捐赠而减轻或赦免,财富积累的正义性在于向穷人慷慨捐赠。富人要想进天堂,唯一的途径就是将自己的财富捐给穷人。在基督教看来,金钱等世俗的东西都是上帝让每一尘世的个人暂时托管的,并不永远属于某个个人,最后都要如数归还给上帝。在西方的传统观念看来,当一个人离开人世之时,身后还留下一大笔财富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置,没能归还给上帝或捐赠给穷人,就是莫大的耻辱。至于以后的新教“天职观”则进一步认识到,财富是上帝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入账,只要通过诚实劳动,懂得节制和服从法律和道义,赚钱越多越证明上帝青睐你,越是获得世俗的成功越证明上帝对你恩宠。但是财富不能用于奢靡的享乐,这时候个人的财富已和上帝的荣耀融为一体。至于后来的马克斯·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更是肯定了通过诚实劳动,发家致富的合理性,强调获取财富和世俗的成功是服务于上帝的一项神圣的义务和使命。由这一传统决定了在西方各国,无论英国还是法国,商人都极受尊重。他们还认为,一个人投身海外从事商业贸易,最后没有能带回一笔财富是不体面和不荣耀的事。西欧各国都以个人财富的多寡来划分阶级,国王是最高层,下面是诸侯,诸侯中又分公、侯、伯、子、男及骑士,最底层的是平民。由此可见,新教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获取财富的道德依据,通过个人奋斗,履行天职,尽职、有节制、勤奋就能接近上帝。西方伦理观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有着“罪富”思想,尤其是富人拥有巨大的财富就有巨大的责任。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在其《财富的福音》中就写道:“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句名言深深地影响了几代美国人,比尔·盖茨也曾说过拥有巨大的财富“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并言行一致地捐出了自己全部的财产用作慈善基金事业。在这种基督教信仰观的观照下,西方资产阶级为财富的积累竭尽全力,这是在尽天职,在接近上帝,这种财富观是整个社会的慈善事业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导向。

中国人的信仰是要在人间建立精神王国。讲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它不需要上帝的召唤,仅靠自身的良心,它少了一种外在的神圣的力量的约束,实在无与伦比,但现在被我们遗忘了、丢失了。又因它缺乏教堂式的载体,缺乏仪式和明确的教规,使

人容易坠入五里雾里,加之儒家追求“足用财富观”,又囿于小农经济、重农抑商等的经济、政治环境和条件的制约,财富不可能迅速增长。而西方的增长财富观则专门研究财富的内在性质,使财富增长的路径、方法。对那些读书为了当官,当官为了敛财的人来说,就是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官员聚敛的财富大都是作为家族的遗产不断传承下去。最终,现实中的财富统统服务于皇权政治。在宗法社会,商人从来要依附官府,投靠官府才能发财致富,根本没有独立人格,有了钱然后再读书,再设法当官。所以,中国社会历来是以权力来划分社会等级,例如(元制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一方面儒生讲内在超越,另一方面九儒的卑贱地位与之形成鲜明的反差。这种矛盾的纠结,导致中国的士大夫认准了一条光明的路,那就是要想飞黄腾达,就必须要入士为官。而西方的传统认为,人要有地位,就要靠个人财富的不断增长,人死后自己的遗骨能存放在“人骨教堂”是身后进入天堂的标志,是一生最高的荣耀。这就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人尤其是平民百姓追求财富要受到政治和宗法社会的限制。中国儒家的内在超越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宗法专制主义的皇权政治的。

亚里士多德与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观点不同,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比公有财产制度更能增进财富,更符合人性的正义。再后来罗马人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将伊壁鸠鲁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融入经济思想中,使自然法原则对财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后阿奎那论证了私有制是人类理性创造出来的,而理性是出自上帝的意志,于是上帝就成了自然法的代名词,这就为财富的私人占有找到了根据。罗马法还规定了交易的自由,商品所有者身份的平等,商品的平等价值标准等。另外,古希腊特殊的地理位置促使海上贸易的发展,其历史文化和城邦的人口数量等因素决定了城邦的民主传统和自由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财富的增长。基督教时代的国王与教皇的权力纠结使思想家、宗教家、知识分子并不完全依附于政治权势,这就为自由地探寻财富增长提供了各方面的条件和保障。

中国的“礼”是专制制度、仪式和规范的统一体,是为维护皇权统治的和谐与稳定服务的。尽管中国社会很早就承认私有财产,但实际上在礼制视域中的财富均应归结为皇权或王朝,君权乃是国家之整体利益,这种整体利益往往是以主

奴、君臣的面目出现，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所维护的私有财产已换成了公、整体、家族、官僚体系、皇权一统的面目，平民的私有财产被缩小到最小的程度。儒家的礼制还导致政治重于经济，有凌驾于经济至上的倾向，入仕为官是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稳定来源和保证，家族整体主义泯灭了个人权利和对财产积累的积极动机。礼制的等级结构导致把“看守的权力委托给了狼”，这是一种温情脉脉自称为父母官的“狼”。这种文化传统的遗存导致现今一些腐败官员利用特权与资本的勾连把属于人民的财富攫为己有。

西方的思维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主客两分，从概念、判断到庞大的形式逻辑，再到近代表现为实证实验的方法，中国的思维模式主要特征是阴阳和谐、整体和谐、直觉顿悟和有机论的思维方法。西方对财富本身悉心探究，着力于对内在性质之研究，中国则着力于在财富中的人性、义利与外在的关系方面用力。西方着力于从经济问题上探讨财富的增值问题，中国只是停留在从义利的层面剖析财富的善恶问题，对财富本身没有形成什么理论。西方很早就致力于研究财富的分配正义的问题，中国虽然也主张“不患寡患不均”的分配问题，其区别是前者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而后者从未形成财富分配的理论体系。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有利于政权的稳定但不利于财富的增值；西方的分邦割据形成小国林立用心于财富的算计和运作，有利于财富的增值。中国的整体主义压抑了个人的主体性，遏制了个体的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西方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使个人主义在近代从国家权力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在追求财富增长时更加自由、积极和公平。这是慈善伦理不能不考虑的一个文化传统的差异。

由于上述中西财富观的差异导致慈善传统的渊源不同，慈善事业在发展的规模和价值取向上多有不同。本书正是循着这一中西比较的思路展开慈善伦理及其公民慈善理念的培育的探究。

自有人类开始就有了慈善。什么是本我人性呢？一个人在世界上无法独立生存，他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慈善基于人性本能的互助，并在习惯中超越理性，终于导向纯粹的付出。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化，人们都不能否认，人在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和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的共通性。正是这种一致性和共通性，构成了人类的普世价值观——社会共同体中任何人都不应对

他成员的命运漠不关心，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爱护他人。我国上下五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所提倡的是“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的仁爱精神、“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道德要求。传统慈善大多是出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道德上的自觉。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出来的慈善思想与西方基督教体现的博爱思想有共通性的。儒家讲仁爱、佛家讲慈悲、基督讲博爱。儒家认为，仁是最高的美德，是与生俱来的本性，想要做一个完善的人，就要行“仁”。基督教强调对弱者的爱护就是对上帝的虔敬，对弱者的冷漠就是对神的损害。为此儒家之仁和基督之爱，两者间有共同基础。

儒家从人性本善的前提出发，把慈善的伦理动力归因于人的道德良知，行善之目的是为了获得良心的满足与内在的需要，所以慈善是一种内省与自律的要求。在中国，慈善行为需要被人知道，民众也非常关注有社会影响力的各种明星与企业的捐赠额度。其原因是，在传统文化中将慈善看作是个人的道德品质，作为公众道德评判的标准，往往成为“宣扬的慈善”。而基督教从“人性本恶”出发，认为人生来就有原罪，将行善的伦理动因归因于上帝，行善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因此基督教慈善是一种他律的诉求。在基督教义中，施予应悄悄的，在《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讲到“论布施”时说，“你布施的时刻，不要叫左手领略右手所作的”，这才算是真正的慈悲。倘若布施的人敲锣打鼓，让所有人都领略他在行善，那么他的行善目的就值得猜疑，在康德看来这就是无德行的行为。当然，中国自古也有敬德保民，兴办慈幼局、养济堂等各种慈善机构。如发生灾害有各种惠民救济措施，如施粥、赈谷等，以此抚恤民众。但相比较而言，中国的贪官藏富的多，因为他们深知财富来路不明，本来就舍不得捐赠，加上还会带来嫌疑，所以一般会采取不捐、迫捐等行为方式和态度。眼下的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慈善事业意义尤为重大。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爱有差等的，中国人的爱是有层次的、有圈子的、有亲疏的，是以“爱亲”为核心并在社会关系上由近及远的同心圆。中国人对尊贵者与亲人情深意笃，而对卑贱者与陌生人感情淡薄。在中国社会中虽然不乏博爱之举，但是这种利他主义的博爱却不像基督教在西方那样深入人心。另外，中国传统伦理观中“义”所涵盖的慈善精神与西方伦理观中“爱”所涵盖的慈善精神也有

差别。现代意义上的慈善精神，不应该是舍生取义，牺牲个人所有去帮助别人，而应该是爱人如己的博爱观，而这部分的爱在中国伦理观中被留在了家庭内部。西方文化中，慈善理念来自原始宗教，“博爱”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传统是主要渊源。“博爱”提倡爱的精神，认为通向天国的道路重要的是在于有一颗博爱之心，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伦理普遍主义传统，因此这种爱是普遍的爱，是无等差的爱，是无条件的爱。

儒家对人的理解一开始就把人规定为是处于人伦关系中的人，人伦是人的本质与人之为人的关键。中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行善总带有某种功利色彩，比如赎罪、求名、消灾，等等。而基督之爱则是立足于上主创世立人之初的原始境遇，立足于众人都是上主儿女，彼此应该相亲相爱。相形之下，西方平等给予的理念将捐助人和受助人的人格置于平等的位置，是现代慈善理念的良好阐释。基督教反对假冒为善的虚伪和诡诈，提倡人要以一种谦卑之心去行善积德，从自己的善行中获得心理满足，但不必企望被他人知道，而且要始终自知其善行微不足道，还需不断努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统治者的仁政与民间的慈善是相排斥的。按照传统的治国理念，政府应是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以此彰显政府的强势与道德优越性。这种政治理念导致民间慈善发展缓慢，公民慈善意识较弱。相形之下，美国历史上，存在着互济文化的传统。美国在独立之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社会保障，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彼此互助互济，社区的互济活动由此非常普遍。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家国统一思想，仁人志士也从内到外、推己及人为家国奋斗，既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理念，也有“各家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价值观念，财富是世代相传的，守住并壮大家族产业成了多数人的守财观念。并且，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整个民族心理存在“崇富”与“罪穷”思想，富人成了人人仰慕的对象，而穷人反而被认为天生该穷，身负原罪。在这两种慈善文化的框架之下，中西慈善活动方式表现出以下差异：美国的慈善活动是自下而上的推进，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慈善事业，慈善组织多是市场自发式。中国的慈善活动多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以官方组织为主体的慈善事业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与现代慈善事业的精神与运作方式相差甚远。

今天的时代和今天的中国需要慈善的社会、慈善的事业和慈善的人。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慈善之人。倘若我们能真正领悟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行为上能身体力行，我们就能热心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付出一点物质、一点精神、一点时间、一点心血和辛苦，只要是出自内心，就是在做慈善的事。真正的菩萨，也是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人。只要努力，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菩萨。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问题的关键是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人们，是否希望我们身边的人都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与慈善最为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倘若我们在日益攀升的唯物质主义、唯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充斥整个世界的今天，如果我们能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一事当先能“以义为先”、“以义制利”，能讲情义、道义和正义的话，你即便没有做什么慈善的事情，至少也是一个慈善的人，这样的人多了，就能形成慈善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不会有人被穷死和饿死。

我们往往只在物质的付出、捐出上衡量一个人慈善与否，实际上，真正的慈善应该提升为在思想观念、价值观、信仰上对人的引领。那些一天到晚想着怎样赚取更多钱财的人，他们更需要得到精神上、价值上和信仰上的引导和帮助。随着科学的进步，投资的回报，社会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两极分化得到较好的消解时，人们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得到温饱”，而是“怎样处置自己”，现在在中国这样的人已经为数不少，如何教会这些人善用闲暇才是今天所需要的慈善行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周游世界或全国，还有人以“炫耀性消费”来满足自己有闲的虚荣。那些“无所事事的富人”和地位很高、工作异常繁忙受制于他人意志的“奴仆”一样都没能很好地运用他的自由意志。《圣经》中讲到上帝对人的最大考验是给予他们偷食禁果的自由，而亚当、夏娃怎样行使他们的自由，就是人类历史的开始。“可见‘闲暇’不意味着无所事事的沉闷，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善用‘自由’的问题。”（林沛理：闲暇与自由意志《亚洲周刊》2014年第24期）

21世纪的当下，人们驾驭科学技术亦即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但是驾驭和掌控自身欲望的人文力量却并没有随之而提升，滥用“自由意志”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惯，甚至毫无知觉。人们越来越需要善待自己，善待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善待身边应该帮助的人，善待自己的闲暇。其实不用工作与没事可做是两回

事；从心底里想要慈善和为某种功利而去做慈善，也是两回事。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慈善、需要诚信、需要友善和仁爱，需要善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于社会和他人有益的事，不做过于社会和他人有害的事，这才是为人处世的底线，我以为这也算是在做慈善的事。

陈东利是我的博士生，学位论文就是做关于慈善意识培育的问题，她是一位极富爱心的大学教师，不仅热爱高校的教育事业，在学术研究上更是孜孜以求。《中国公民慈善意识培育》一书是她花费整整三年时间呕心沥血，上下求索的作品，读到这本书稿，心中一阵喜悦，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阐述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公民慈善意识培养的有效途径，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现在已被上海大学出版社看中，正拟出版，东利盛情邀请我写序，我乐此不疲，在为期一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挤出时间终于草拟完成。

同济大学教授、博导：邵龙宝

草于马来西亚古晋市砂拉越地宫大酒店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联合会、孔子基金会、马来西亚孔学会联合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

目 录 | Contents

绪 论

/ 001

一、问题提出与选题意义 / 001

(一) 我们为何需要慈善 / 001

(二) 本书研究的着眼点 / 006

(三) 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 007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 012

(一) 西方相关研究综述 / 012

(二)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015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024

(一) 研究方法 / 024

(二) 基本思路 / 026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028

(一) 创新之处 / 028

(二) 研究难点 / 029

第一章 公民慈善意识的概念及其内涵

/ 031

一、“公民”与“公民意识” / 031

(一) “公民”的界定与划分 / 031

(二) “公民意识”的内涵 / 036

二、“慈善”与“慈善意识” / 038

(一) 慈善的中西方释义及源流 / 039

(二) 慈善的文化内涵及其功能 / 041

(三) 慈善理念与慈善意识分析 / 044

(四) 公民慈善意识的本质特征 / 046

三、对公民慈善意识的诠释与引申 / 049

(一) 人道与人本 / 049

(二) 公平与正义 / 051

(三) 权利与责任 / 056

(四) 人格尊严与平等 / 058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慈善理念

/ 061

一、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伪善 / 061

(一) 马克思主义对伪善的批判 / 061

(二) 批判慈善的社会历史因素 / 063

二、社会主义慈善的唯物史观基础 / 065

(一) 慈善合乎唯物史观的解读 / 065

(二) 慈善关乎人的自由与尊严 / 066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慈善理念 / 068

(一) 慈善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 068

(二) 慈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069

(三) 中国特色慈善理念的目标 / 071

第三章 中西慈善观的嬗变及现代启示

/ 073

一、西方慈善思想探源及历史嬗变 / 073

(一) 古希腊古罗马的慈善渊源 / 074

(二) 基督教的慈善理念及嬗变 / 077

(三) 近代西方慈善伦理的发展 / 079

(四) 现代西方慈善理论的依据 / 084

二、中国传统慈善思想探源及价值 / 087

- (一) 儒家“仁爱”的慈善思想 / 088
- (二) 佛家“慈悲”的大爱情怀 / 092
- (三) 道家“积善”的善恶观念 / 094
- (四) 近代慈善理念的融合发展 / 097
- (五) 传统慈善理念的现代意义 / 099

三、中西方财富观与慈善伦理探析 / 101

- (一) 信仰上的外在与内在超越 / 102
- (二) 礼法上的自然法与礼制 / 105
- (三) 思维上的认识论与伦理学 / 106

四、中西方慈善伦理的比较与启示 / 107

- (一) 中西传统慈善理念的比较 / 107
- (二) 原则：借鉴吸收与批判继承 / 112
- (三) 关注：制度、尊严、以人为本 / 113

第四章 影响公民慈善意识的不良环境及成因

/ 117

一、影响公民慈善意识的不良环境 / 117

- (一) 行政色彩浓的官办慈善 / 118
- (二) 公信力危机的慈善组织 / 121
- (三) 参与度不足的被动慈善 / 125
- (四) 财富观迷失的缺位慈善 / 129

二、公民慈善意识不良环境的成因 / 131

- (一) 政府角色定位的偏离 / 131
- (二) 健全法律制度的缺位 / 132
- (三) 良性经济运行的欠缺 / 136
- (四) 正确舆论导向的偏失 / 137
- (五) 现代财富伦理的匮乏 / 140

第五章 公民慈善意识培育的理论依据与内容

/ 144

一、公民慈善意识培育的理论依据 / 144

(一)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 145

(二) 西方的公民社会理论 / 147

(三) 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 / 150

二、公民慈善意识培育的主要内容 / 154

(一) 公共责任意识 / 155

(二) 财富分享意识 / 157

(三) 感恩回馈意识 / 159

(四) 良心关怀意识 / 162

(五) 理性奉献意识 / 164

第六章 公民慈善意识培育的环境建设与路径

/ 166

一、政府慈善角色的新定位 / 166

(一) 中美政府的慈善角色比较 / 167

(二) 政府慈善角色的重新定位 / 170

二、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提升 / 173

(一) 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意义 / 173

(二) 挽救公信力的路径选择 / 176

三、企业公民慈善社会责任 / 179

(一) 企业社会责任与慈善文化 / 179

(二) 提升慈善文化与责任意识 / 183

四、慈善法律与制度的完善 / 186

(一) 慈善立法的重要意义 / 186

(二) 强化监督与完善税收 / 188

五、传媒的慈善宣传与监督 / 191

(一) 大众传媒的慈善社会责任 / 191

(二) 大众传媒的慈善宣传作用 / 193

第七章 公民慈善意识培育的重点对象与手段

/ 197

一、公民慈善意识培育的目标与原则 / 197

(一) 以真善美人格的塑造为目标 / 197
(二) 以分类化和分阶段化为原则 / 199
二、青少年慈善意识培育方法与手段 / 202
(一) 青少年慈善意识培育的现状 / 203
(二) 青少年慈善意识的显性教育 / 205
(三) 青少年慈善意识的隐性培育 / 207
三、富有者慈善意识培育与财富伦理 / 212
(一) 富有者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 212
(二) 企业家慈善意识的义利之辨 / 215
(三) 慈善意识与财富伦理的建构 / 216

参考文献	/ 220
------	-------

后 记	/ 232
-----	-------